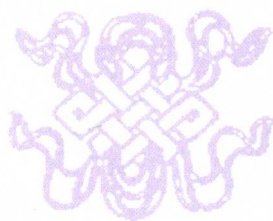


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



QINGDAI ZANGXUE
LISHI WENXIAN YANJIU

刘凤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

QINGDAI ZANGXUE

LISHI WENXIAN YANJIU

刘凤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责任校对:吕 飞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刘凤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1

ISBN 978-7-01-015410-7

I. ①清… II. ①刘… III. ①藏学-文献-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1697 号

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

QINGDAI ZANGXUE LISHI WENXIAN YANJIU

刘凤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90 千字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978-7-01-015410-7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	---

上 篇

第一章 清代藏族人物传记的编纂理论与实践	11
第一节 宗教人物传记编纂的进一步发展	11
第二节 世俗人物传记的编纂及特点	25
第二章 清代藏族教法史的形式与内容	34
第一节 趋于多样化的编纂形式	34
第二节 几部典型教法史的史学特点	36
第三章 五世达赖喇嘛与《西藏王臣记》	81
第一节 《西藏王臣记》内容与“正统论”编写旨趣	82
第二节 《西藏王臣记》的编纂思想及局限性	84
第四章 清代藏族方志的繁荣及特点	90
第一节 清代藏族方志的命名与类型	90
第二节 几部典型的方志书	93
第五章 清代藏族其他历史文献	111
第一节 清代藏文档案文献	111

第二节 五世达赖时期制定的《十三法典》	116
---------------------------	-----

下 篇

第六章 清前期藏学汉文历史文献的初步发展	125
第一节 清军首次进藏对汉文藏学历史文献的影响	125
第二节 皇家思想与清代藏学历史文献	136
第三节 清代汉文西藏方志的发展及成熟	145
第四节 乾隆初年藏学文献的进一步发展	167
第七章 清中期传统藏学历史文献发展概况	186
第一节 清中期传统藏学历史文献的繁荣	186
第二节 清中期西藏方志的编纂	190
第三节 驻藏大臣与藏学历史文献的新发展	199
第四节 周蔼联与《西藏纪游》	216
第八章 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晚清藏学历史文献	219
第一节 晚清藏学历史文献发展概况	219
第二节 姚莹与《康輶纪行》	227
第三节 从钟方到张其勤	234
第四节 《西藏小识》与藏学历史文献的新变化	242
主要参考文献	249

导 论

一、清代藏学历史文献概况以及研究意义

我们在谈论传统藏学历史文献时,往往是指两类著作,一是藏族学者所编纂的有关西藏宗教、历史等文献,这些基本上为藏文著作;二是内地人士对西藏史地、社会风俗等的相关记载和研究,多为汉文文献。伴随着清代对西藏治理的逐步加强,这两类文献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藏文历史文献在佛教文化的笼罩下,虽然变化较为缓慢,但在继承中仍有变革,人物传记、教法史、方志等历史文献数量超越前代,在编纂过程中,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对史籍的编纂理论加以探讨,这是清代藏族史学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7世纪中期,蒙古首领固始汗击败了西藏藏巴汗政权,为格鲁派在西藏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一历史转折不仅改变了西藏的政治局势,对学术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文献编纂中格鲁派掌握了话语权,一些高僧大德从格鲁派发展的角度评判历史,推动着藏学历史文献的变化与发展,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土观宗派源流》对已掌握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评论各学术派别得失,在藏族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献编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佛教史观指引下,藏族历史文献大都紧紧围绕着佛教展开,与社会政治一般保持着较远的距离,但个别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学者,如五世达赖喇嘛、桑结嘉措等人为维护其统治,所编纂历史文献含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藏族历史文献较为单一的形式与内容,其社会史料价值也因此大大提高。

随着清代对西藏治理的不断加强,进藏人员越来越多,汉文藏学历史文献在清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藏文历史文献不同的是,汉文藏学历史文献在

清代的发展变化非常明显,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清前期,对西藏了解最深者莫过于进藏的军人,他们是揭开西藏神秘面纱的先行者,如李凤彩的《藏纪概》、子铭的《西域全书》等,撰者都是进藏的军人,因此,清初藏学历史文献明显带有军事色彩,但随军从戎者对西藏的认识完全属于偶然的际遇,他们或不能深入考察,或手中文献无征,导致清初藏学历史文献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清中期藏学历史文献的发展也同样受战争因素的影响,廓尔喀的入侵,以及随后的驱廓战争对藏学历史文献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藏学历史文献都深深地打上了此次战争的烙印。驻藏大臣的设置是推动清代藏学历史文献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驻藏大臣及其随同人员能够久居西藏,为他们撰写藏学文献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驱动下,他们考察西藏的山川河流,记述风俗民情,并为加强边防安全提出建议,这是推动藏学历史文献发展的重要因素,《西藏赋》《西招图略》《卫藏通志》等很多作品因其丰富的史料,成为我们研究西藏史的重要参考书目。晚清时期,国家危难,英俄两大强国对西藏垂涎三尺,西藏逐渐成为世人关注焦点之一,对边疆安危的紧张与焦虑推动着人们对西藏的认识不断深入。这一时期,很多学者从西方近代人文科学视角看待西藏问题,论证西藏与内地相互依存的关系,为解决西藏危机出谋划策,晚清藏学历史文献也因此呈现出新的特征。

清代藏学历史文献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研究清代藏族史以及汉藏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进一步加深对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总结藏族文献编纂的特点,有利于我们吸收借鉴古代藏族书籍编纂的经验。藏文文献在数量上是仅次于汉文文献的民族文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更是古代藏族文献创作的高峰期。但藏族学者重编纂经验,缺少理论性总结,尽管说清代藏文文献中出现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如对人物传记编写原则,对方志编写意义等的论述,但总体来看,理论性阐述是非常缺乏的,因此,我们想了解藏文历史文献编纂情况,只能从众多的书籍中探寻其编纂模式,从中研究古代藏族学者的编纂方法。因此,通过对清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藏族历史编纂学加以总结,分析其编纂特点,考察其史学价值,以继承这一宝贵的传统文化,并希望能对现代书籍编纂起

到借鉴意义。

2. 分析藏学历史文献发展的原因,总结历史规律。文献编纂及内容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密不可分,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的发展首先得益于西藏在很长时间中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局面,清代藏族高僧大德们有时间和精力撰写出大量的教法史、人物传记、寺志等,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条件。汉文藏学历史文献的发展又告诉我们,藏学历史文献的发展代表了人们对西藏的认识程度,只有深入西藏亲自进行实际考察,将实际调查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推动藏学历史文献的发展,也只有对西藏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有深刻认识,才能更好地治理西藏,推动西藏社会稳定发展。可以说,清代汉文藏学历史文献的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沉痛的教训,由于古代文人缺乏科学考察精神,从儒家文化视角去观察西藏,导致我们对西藏的认识有时反而不如西方学者,晚清人士对此痛心疾首,我们不能不牢记这一历史教训。

3. 比较汉藏历史文献发展特点,探寻汉藏文化交流及发展的共性。汉藏两类藏学历史文献在清代都较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一方面藏族学者对汉文化的认识加深,在历史文献中出现了汉文化的论述,如清中期章嘉·若必多吉的《圣地清凉山志》记五台山的史地,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土观宗派源流》对汉文化的阐述等,说明藏族学者对汉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内地学者在清中期开始利用藏文史书撰写西藏的历史,如《卫藏通志》等利用一些藏文史籍梳理西藏的历史,至清末,人们对藏族历史文化有了更加全面详细的认识,大量借鉴藏文史籍撰写西藏历史,如张其勤的《西藏宗教源流考》一书参考了大量的藏文史书,开创了新的书写模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清代汉藏文化交流频繁,学术交往过程中互相影响,在历史文献编纂上呈现出相似的学风,这是研究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的重要意义之一,如清代占据学术主流的考据学对藏学汉文文献有很深的影响,清前中期汉文藏学历史文献考证学色彩非常明显,而藏文史籍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诸如《西藏王臣记》、《如意宝树史》等书,旁征博引,考证方法灵活多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反映出清代藏汉共同的学风。通过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一文

化现象,反映出藏汉文化内在联系。

二、目前国内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综合性研究藏学历史文献的成果,首推王尧主编的《中国藏学史》(民族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书中对藏学历史文献从古至今作了简略叙述,对清代藏学历史文献(含藏文、汉文)作了全面介绍,但由于该书跨度较大,因此,书中对藏学文献主要在于介绍,对于一些具体的史籍研究不够深入细致。孙林的《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认为清代是藏族史学发展与成熟阶段,书中对藏族各种体裁的史书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对人物传记的写作理论和宁玛派的文献学理论作了深入分析,对我们了解清代藏族历史文献理论的发展极为有益,书中对清代人物传记的编纂,吸收了国外一些研究成果,论述非常深刻,很有特色。王璞的《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清代部分详细论述了 10 部著名史书的编纂与内容,也是目前研究藏族历史文献的重要参考书。但由于这两部著作视角在史学史方面,未能从文献学角度对藏学历史文献展开论述,而且两部著作冠以藏族,没有将有关汉文文献纳入研究范围,故对汉藏文献的互动也缺乏研究。

近几十年来,对藏文历史文献研究的论文不断增多,其中既有系统性的梳理,又有对某一专著的研究。王尧的《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2 期)一文涉及多部清代藏文史学名著,对我们研究清代藏学历史文献很有帮助。王尧、沈卫荣的《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2、3 期)对藏族史学的发展及文献的特点作了精彩论述,文中还特别指出清代藏族史学有三个特点,一是史家多,二是史著数量多,三是体裁形式多样,这也说明清代藏族历史文献研究有重大意义。满达仁编译的《西藏研究历史文献简述》(《西藏研究》1985 年第 4 期)对部分中外藏学历史文献作了简单的介绍,涉及一些清代文献及研究的内容,但受篇幅所限,失之于略。其他对专门史著研究的文章也很多,如阮铭树的《五世达赖及其〈西藏王臣记〉》(《西藏研究》1987 年第 1 期)、德·孟克巴特尔的《松巴堪布·益希班觉尔及其著作》(《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第 2 期)、张子凌的《论藏文史籍

《如意宝树史》的文献价值》(《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丹曲的《藏族历史上的〈佛历表〉(bstan-rtsis)——兼谈第一世嘉木样〈佛历表〉的内容与价值》(《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拉先加的《〈安多政教史〉的文献学研究》(《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等,这些对某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著研究的论文都有一定深度,对研究藏学历史文献编纂很有借鉴意义。值得提出的是,国外学者对藏学历史文献的研究方法很新,美国学者 Janet B. GYATSO 的 *Autobiography in Tibetan Religious Literature: Reflections on Modes of Self-Presentation* (TIBETAN STUDIES, volume 1, NARITA 1989. JAPAN, 1992), 对人物传记的史料运用及自传体的产生作了深入研究,较有新意。美国学者吉恩·史密斯的《西藏文献概论》(美国波士顿智慧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本人未见到,据陈立华译《〈西藏文献概论〉前言》(《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从文献与西藏文化关系出发,论述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引学者入门之效。

关于汉文藏学文献的研究成果也较丰富,从地方文献或方志的角度综述藏学文献发展的有,何金文的《西藏志书述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孙宏年的《试论十九世纪中后期西藏史地研究》(《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张莉红的《西藏地方文献考略》(《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彭升红的《清代民国西藏方志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的《我国首批西藏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等,这些论著系统地论述了藏学汉文文献产生及发展过程,并对这些文献的特点作了初步分析。

目前,就清代汉文藏学历史文献某一部专著进行深度研究的论文较多,如对《西藏志》作者研究的论文就有张羽新的《〈西藏志〉即萧腾麟所著〈西藏见闻录〉考》(《文献》1986年第1期)、赵伍的《〈西藏志〉著者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谢晖的《乾隆〈西藏志〉作者小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邓锐龄的《读〈西藏志〉札记》(《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这几篇文章在考证《西藏志》作者的同时,对其编纂情况、文献价值、版本流传等也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卫藏通志》的研究有张羽新的《〈卫藏通志〉的作者是和宁》(《西藏研究》1985年第4期)、曹彪林的《〈卫藏通志〉作者辨析》(《西藏研究》2009年第4期)等文章,关于《西藏

赋》的研究有池万兴的《和宁及其〈西藏赋〉》(《济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与《赋海奇葩西藏方志——论〈西藏赋〉的文献价值》(《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孙福海的《卫藏方志,雪域奇葩》(西藏民族学院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李军的《〈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船山学刊》2012年第4期)等。晚清汉文藏学历史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康輶纪行》的研究上,如陈进忠的《姚莹与〈康輶纪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刘建丽的《略述〈康輶纪行〉的史料价值》(《西藏研究》2011年第2期)等。以上这些文章澄清了个别文献编纂的细节问题,评价了其文献价值,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藏学汉文文献的编纂特点及学术价值等奠定了基础。

从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的研究,既有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又有个案的精深研究。系统性的论著对汉藏文献体裁的发展,文献编纂理论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一些个案研究则在考证作者生平及撰写年代,探讨书籍编纂的学术价值方面较为细致深入,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上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对藏文历史文献研究不够深入。目前对清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研究,系统梳理者往往过于简单,多是介绍性的叙述,个案研究虽细致深入却非常零散,只是就事论事,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如清代人物传记编纂的理论、方法以及发展的原因,教法史的体裁特点,方志的编纂理论等都没有深入的研究。此外,目前学术界对各种史书的编纂目的认识不够,法国学者米歇尔说:“历史编纂学形成的领域很明显,它或围绕君王,或亲近公众,或是其所做的,或是其所喜爱的”^①,藏文史籍的编纂其实也具有这一特点,《西藏王臣记》《格鲁派教法史》《土观宗派源流》等书各有其编纂旨趣,而且与当时社会局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反映出文献与社会的互动,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2. 对考据学与清代藏学历史文献关系研究不足。清代是内地藏学发展较快阶段,这一时期作者受考据学风影响,学者多以考据学为研究手段,形成了清代藏学历史文献发展的特色,目前对考据学与清代藏学汉文历史文献关系

^① [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历史书写·书写与历史》,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的研究较为缺乏。对藏文史书所表现出的考据学风,虽已有学者论及,但对其考据方法以及特点研究不足。

3. 清代汉文藏学历史文献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一方面学术界缺乏对之系统深入的论述,如清代汉文藏学历史文献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及原因,这些问题研究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对个案的研究,有些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如对《西藏志考》《西藏志》的史料来源问题,虽然讨论非常热烈,但都没有注意到此前的《西域全书》,造成人们空想臆断,与历史事实不符。

三、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运用文献考证法、比较法研究清代汉藏历史文献的发展过程及特点,既从总体论述历史文献发展状况,又对个案详细分析,力求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

因汉藏历史文献发展特点不同,本书分上下篇对汉藏历史文献的研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上篇研究藏文历史文献,因清代藏文历史文献变化缓慢,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故分体裁研究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缺陷。汉文历史文献阶段性很明显,因此,本书下篇分清前中晚期三个阶段分别研究,对于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与一般清史研究也略有不同,清前期主要是指从清朝建立至乾隆十五年(1750)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这一时期藏学历史文献主要作者群为进藏的军人以及活动在进藏路线上的官员。清中期主要是指乾隆十五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时期藏学文献的作者除了进藏的军人外,还有驻藏大臣及随从驻藏大臣进藏的文人等,这是传统藏学历史文献走向成熟时期。鸦片战争后到清朝结束为晚清,这一时期撰写藏学历史文献不再局限于进藏人员,很多内地人士也纷纷撰写文章寻求解决西藏危机的良方,使藏学历史文献呈现出新的面貌。

上 篇

第一章 清代藏族人物传记的 编纂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宗教人物传记编纂的进一步发展

人物传记是藏族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编纂历史,至清代,藏族人物传记不仅数量增多,而且编纂理论与方法较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高僧大德的传记,一方面由于其弟子为纪念其弘扬佛教的功德,怀着深深的感情记述其生平历史,在撰写前辈传记时表现出不容推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高僧的德行可以给世人以榜样示范作用,对宣扬佛教、教化世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宗教人物传记在藏族史书中占据很大的比重,一些具有殊胜事迹的高僧,其传记不止一种,如宗喀巴的传记留传于世的近三十种,五世达赖生前在撰写其自传时,也已经有两部有关他的传记。在长期的历史编纂过程中,传记体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其编纂方法也不断发展完善。清代藏族人物传记的编纂继承了优良传统的同时,又在实际撰写过程中对这一体裁从理论与方法上加以总结,推进了传记体裁的进步。

一、宗教人物传记编纂方法

宗教人物传记在藏族史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藏族人物传记的主体,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僧人传记。朗达玛灭佛虽一度给藏传佛教发展带来灭顶之灾,但不久,佛教又从青海、阿里再度复兴,进入藏传佛教后弘期后,僧人逐渐成为藏族文化的主要控制者和主导者,故高僧传也相应占据了传

记体的主体,随着高僧传记编纂经验的积累,这类传记编纂方法也相对成熟。清代藏族宗教人物传记进一步发展不仅表现在其数量的空前增多,还体现在人们对这一体裁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如五世达赖喇嘛的《三世达赖喇嘛传》《四世达赖喇嘛传》《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和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周家巷的《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等,这些人物传记在论述编纂缘起时,都或多或少谈到了人物传记编纂方法等问题,他们的论述既有共同的趋向,又有不同的见解,反映出清代藏族宗教人物传记编纂理论与方法渐趋成熟,这是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发展的重要表现。

1. 关于人物传记撰写的意义。宗教人物传记撰写目的在于宣扬佛教和高僧的德行,这几乎是所有高僧传最为突出的撰写旨趣。不过,阅读清代高僧传,我们可以发现,著者在编写时之所以重视选德行高尚者,不仅是纪念、宣传这些人物,而且更看重这些人物传记所起的社会教育意义。五世达赖非常重视史书的教育功能,一生当中撰写了许多人物传记,在《三世达赖喇嘛传》中,他说:“为了应化之众生,以高僧大德戏乐舞步,将你的事迹简编成文,使人生起诚信之幼芽。”^①这就表明,五世达赖所编写前辈高僧传不仅要将其事迹流传于世,表达纪念之意,而且还有教育世人的意图,作史的目的十分明确。清中期周家巷在《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对宗教人物的传记也作了精辟的总结,说:“应知所谓传记的真实意义,必须是依靠所说的意义和表达的言词,使见闻的徒众们获得一种能成为一种解脱和一切种智的因素。”^②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撰写章嘉国师的传记时,引用《释迦牟尼本生传》和《至宝明灯陀罗尼》的传记编纂理论,并提出宗教人物传记的意义在于,“使那些以前没有产生善德资粮的根本即不信仰之人生起信仰,使已生信仰之人增益并发展,迫随于行为符合教法之人们,学习诸伟人之榜样”^③。这些言论基本上代表了清代藏族宗教人物传记编纂的共同旨趣。

① 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② 周家巷:《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郭和卿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③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